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选登（三）

1938年12月3日

早，刘县长又来了，这时94军政治部宣传队的张队长也在这里，我替他们介绍了后，彼此坐下。张队长也是刚从教育界出来的，过去在上海美专毕业。他与在军队很久以致模糊了自己的认识的人究竟不同，对于我们的旅行救亡特别表示同情。我们3个人从抗战谈到地方工作，从地方工作谈到石首的绅士，刘县长说：“我到任以来，石首的绅士告我不下百余状，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和他们同调：他们要吃钱，我不许他们吃钱；他们要腐化，我不能同他们腐化；他们理想中的县长要在老百姓面前摆官格，我不但不会摆格，有时还要从田里拉起老百姓来谈话。……”我说：“这不但石首的绅士如此，全中国的绅士都是如此。这次抗战失利，固然另有原因，而绅士在政府与人民中间筑起了一道厚墙，使上下不能相通，以致人民埋怨政府，因而对于抗战亦不感到兴趣，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原因。”

吃过了早饭，刘县长骑马从我们的寓处经过，和我道了别后，便回县府去了。我们开始贴标语，以后又由同学们在街头讲演并唱歌。到了午后4时，大家回到寓处休息。今天的宣传工作，总算多少做了一点。

1938年12月4日

我们把从藕池步行到沙市的路线打听清楚后，就预备出发，张队长跑来送我们，他这样多情，我们只有感谢啊！

走了不远，我们便在江边看到那里有好几只负伤的商船，有的断了头，有的折了腰，有的尾分了一半飞堕在岸上。这正如我们前次在华容南门看到被鱼雷炸死了的同胞一样。自然，那是由于自己的无常识；而这是由于敌寇想破坏我们的交通，故把我们的火车、轮船、滥施轰炸。不过即是这断片景象，也可想见敌人在前线或后方屠杀我们兵民的惨状。

约莫20里左右，我们把行李停下来休息。不料，出发时发现一个由藕池区署征发来的挑夫，趁我们不备，藉故逃走了。本来这挑夫我们讲定是付力钱的，路程也只到麻壕口，离藕池仅50里。然而当动身的时候，他十二分不愿意，他的夫人也跑来送他。这证明两点：一、本地人不轻易出门，没有冒险精神；二、官民不能合作。自然我们不是官，然而通过区署的关系，他就认为我们是官。或者怕把我们送到了，不给他力钱。说不定又要他继续再送。总之这都是由于过去所造下来的结果，在现在国难时期，而同胞间竟有这种隔阂，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又想起刘县长的话来了：“当你拉一个老百姓坐在一道想和他谈话时，他总觉得你身上有刺，对你望望又移开了。”的确，我们

几时能看到官民亲如家人父子呢？

路上在一个小镇，由同学们唱了一会歌，并讲演一会，又继续前进。

午后6时，到了沙场，沙场离藕池仅30里，今天因为挑夫耽误的关系，只能抵此地。由交际组朱永禧、何贤标向当地联保主任接洽，我们就在一个小学校住下。吃过饭后，宣传组赶快写、贴标语，便整队向街上出发。举行了一会歌咏，群众愈聚愈多，连两旁茶寮的算在内，总共不下五六百人。我就借了一条板凳，站在上面开始向群众演讲。讲话的内容，大略分为三点：一、日本为什么打中国；二、我们为什么要抵抗；三、我们老百姓应该怎样。我用极通俗的例子解释出来，似乎每一个字都打入了群众的心坎，四周鸦鹊无声，只觉得有无数的岩浆由我的火山口喷射出来。讲完了后，又由同学们唱了一支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谁要强占去，我们和他拚到底。”

从容而高亢的音调，使得全镇的人都愤怒起来。……

（下略）

1933年12月5日

昨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我们所住的学校左侧门无门栓，要关上的时候，必须用讲桌把他挡住，自然从外面可以推开。我们睡到

早上3时左右，忽然听到有人推门，起初以为是同学们出去大小便，但究竟不放心，我便问是谁，回答的声音却是一个陌生的。他说他们是难民，他们有3个人，要在这里借宿。只等我们惊悟他可能是窃盗，县残联保主任来，他才搭起走了。然而他始终是镇静的，一点不表现出窃盗的破绽。但经同学们在月光下窥见，他头上缠着一条蒙面包巾，身上的破旧棉袍未经扣好，在腰间只用一条腰带束住，同时在腰带上斜插着一柄竹根烟袋。这样的装束，活生生的表现出一个小偷儿的典型。可惜他运气不好，恰恰碰着我们大家都醒了。

今天的旅程预计到丹湖堤，距此地约40里。有内河可通民船。我们把行李交民船载去。大部分的人还是走路。这里一带属公安境界，旱田多而水田少，照样子看起来，还是颇富饶的。20里达麻壕口，镇虽不大而赶市的人很多，差不多每一家饮食馆都挤满了人，我们想进去吃点东西，只好这家分几个，那家分几个。我们的船已先走了，大家觉得疲倦，又租了一只船走了一段。

丹湖堤市面较大，然而因为敌机光顾的结果，已经不象平常那样繁闹了。我们由当地残联保主任帮忙给找了一间大的空房子。这个房子前后有4进，上下有两层，但他们说，因为不久前曾驻过伤兵，所以使得门扉和窗棂都毁坏了。历来人们对于兵，特别对于伤兵，总是轻视、厌恶、隔绝……而从不问一个兵为什么负伤？他的负伤与我们的利害关系如何？所以一般伤兵的滋事，与其责备他

们倒不如责备官民不了解伤兵的痛苦或者来得恰当些。

1938年12月6日

今天留在这里休息。那个房子里有些讲桌和一块黑板。我们利用了这机会，就临时布置一个教室，我和王先生召集学生来上课，王先生授了一堂算术，一堂代数，我授了一堂国文。

在那里烧饭的问题，先晚是向一个有钱的人家借锅灶，他非常不高兴；第二天向隔壁一个成衣工人的家去借，相反却表示异常欢迎，一连烧了两天，事事给我们帮忙，这样一个对照，大家不是看得很明白了吗？

1938年12月7日

30里陆路到杨家潭，杨家潭距沙市又30里，这一段有内湖晃船可乘。我们到了杨家潭，才午后1时，便马上催民船两只，连人和行李一并载上去，双桨拨动，我们的旅程又继续下去了。

我前面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欢喜坐船的，然而在一个碧如油的水面上，轻舟客与，伊哑不绝，也未尝不是件快意的事，所以我的反对坐船，也只是在那浑浊的水面上，两岸又是异常的单调，而又加之逆流逆风，这叫人怎不闷绝气绝呢。我们今天乘的两只船，

是所谓江南式的瓜皮艇子，两头翘起，船底很窄小，所以走起来异常轻快，操舟的也不甚吃力。我坐在一只船的尾上。起初在一个小港内行驶，岸上的人家，妇女们有的在种菜，有的在磨粟。我们的船从她们的前面经过，她们还不时停下工作掉头望望。她们这种悠闲的神情，那里知道敌人的炮声一天迫近一天，那里知道现在从她们的前面经过的正是被敌人的炮声逼走的一群呢？其实，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即使是我们，不，至少是我个人，也要忘掉一切的。

（此处有删节）

船只又驶过一个湖，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便达到了。上了岸，黑的夜夜差不多要笼罩下来。我们各人匆忙肩起行李向离此只隔一道江的沙市进发。同学中有未出过门的，看到汽车不知道是什么，我说：这是你们上新课的时候，你们在这些活的书本中是可以学到无限的知识。

渡江后，首先就找当地的警察局。我会到朱局长鼎钧，他马上叫他的属员替我们找房屋，无如因为时间太晏，而且又在都市，一时不易找着，只好替我们找了一家客栈。我们因为人多的关系，为节省起见，只占一间小房子。这间小房子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去，便地板上推铺。我们现在有15个人，就象火柴匣子里的火柴一样挤得紧紧地。然而回想我过去在上海一个短时期的生活，今晚还是享福多了。那时的房子比现在的房子还小，人数也要多，而里头唯一的设备只有一只便桶。我们23个人若是用平体躺下去，疲倦了一翻身，就不想恢复原状了。或者上半身睡下去，而下半身还悬在

空中，若偶一落地，不是在别人的头上，便是在别人的嘴边。这样你骂我，我说你，只等闹到敲了两三点钟，才能彼此疲乏地人压人地惚惚睡去。

（选登完）

〔编者按：《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是朱婴同志在带领旅行团奔赴延安途中匆匆记下的，其原件系毛边纸油印。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我们还只收集到这些。为了保持原作面貌，这次选登时，我们只对个别文字和标点略略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大 哥 朱 婴 略

朱 轮

我的大哥朱婴同志是华容县护城乡人。189 年农历11月24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由西安逼回华容家乡，于1970年7月11日含冤去世。终年76岁。

大哥1919年就远离华容到北京。在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时，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征途。

1926年到1927年，大哥受党的委派，先后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行政委员会书记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险遭杀害，经党组织介绍，1928年秘密到达上海，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驻沪办事处，任主任

1931年，王明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地下党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因为朱婴同志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了王明的打击和迫害，被开除了党籍。虽然朱婴同志暂时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在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人和青年中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他参加邵韬奋同志等组织的救

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创办革命刊物，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

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朱婴同志领着妻子儿女到武汉，得到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和帮助，回华容县创办东山中学，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为延安输送革命青年。1938年下半年，因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反共政策，迫害进步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又先后侵占了武汉、岳阳等地，东山中学被迫停办。这时朱婴同志带领独子朱允一、女儿朱永丽（朱维哲）、妻子朱永辉（胡兆）和东山中学一部分革命青年，由华容起身，经湖北、河南、陕西等省国民党统治区，徒步3个月，于1939年初胜利到达延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更加焕发革命青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

大哥到达延安后，党的组织问题得到了解决。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司法训练班教务主任，高等法院和边区政府秘书。全国解放后，又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司法部司长，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秘书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政协二届委员、三届常委等职。他在工作中，忠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和发展司法工作，培养党的司法干部，为发展西北和陕西省的高等教育、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大哥从上海起就写过很多革命的文章和司法方面的专业文章，

在延安时，还参加了由林伯渠同志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同许觉哉、李木庵等老同志一起，写下了很多革命的诗篇，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英勇抗日的中国人民和军队。非常可惜！现在只有由李木庵同志的哲嗣李万涵同志选进《怀安诗社诗选》中的几篇。朱婴同志的大量文章和诗篇都遗失了，有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流离失所时损失了，有的是1946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时损失了，有的是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十年浩劫中损失了。

大哥大我21岁，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也是我们一大家走上革命的带路人。曾有同志赞誉我们一家人为“红色家庭队伍”，那么大哥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

大革命时代，我还是不懂事的孩童，在小学念书。从那时起，大哥就开始对我进行革命教育，替我取上现在的名字，要永远做红色的车轮，担负革命的重任，滚滚向前。

1930年秋天到1931年春天，贺龙同志领导的洪湖工农红军到达华容，华容成立了地方党、政、群各种组织。由于朱婴同志对我的教育，我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少年先锋队，任普圣乡少先队军委。后来红军没有通知我们就撤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统治了华容。在我快要遭受敌人迫害的时候，朱婴同志十分担心我的安危，他利用他在北京朝阳大学念书时的一个同学的关系，从上海写信让我离开华容，把我介绍到岳州联合中学念书，而避免了国民党反动

派的迫害。

1933年、1934年，我在上海大哥处暂住。那时生活极端困难，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但大哥却毫不放松地对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秘密地介绍我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列主义书籍，帮助我建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1934年秋天，因为经济上毫无来源，连每天吃饭都成了大问题，使我无法继续在上海生存下去，大哥便决定要我回华容农村。他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当他送我到达黄浦江边走上轮船的时候，还用“耕读”二字代表“革命”，拔笔给我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送别诗：“沪滨同住瞬经秋，过隙光阴岂再留！握手唯谈耕读事，登程怕见往来舟！”

1935年以后，大哥在上海办起了革命刊物《我们的学校》，用书信帮助我，教我写革命文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统治的黑暗，在《我们的学校》上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大哥回到武汉，请董必武同志介绍我到延安。以后，他也带领子女、亲属和一部分革命青年到达延安。至日本投降前，我们都在延安工作。大哥仍然不断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我。日本投降后，我去了东北，他留在西北；全国解放后，他在西北，我在中南。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为党工作。他同样从各方面关心和帮助我。

大哥不只是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帮助了我这个小弟弟，就是十

其他的革命青年、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也同样地关心和帮助。这一点也是他一生中十分突出的美德。

十年浩劫中，大哥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他本来很健康的身体批斗得致病致残，成为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最后被迫送回华容老家，又得不到治疗，而含冤去世。那时，他带领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弟弟和子女，同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失去了自由。因此他病残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去照顾他！他在家乡含冤去世了，我们也没有权利去埋葬他！

现在，党和人民群众早已把林彪、“四人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哥朱婴同志和我们一家人都得到了平反。1980年5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还为朱婴同志补开了追悼会，对大哥从1925年参加革命起的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作出了全面的肯定，正确的评价。《在朱婴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明确地指出：朱婴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几十年来朱婴同志为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贡献”。“朱婴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号召我们“要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学习他顾全大局、识大体、服从组织分配、遵守革命纪律、积极钻研业务、做好工作的坚定党性，学习他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团结同志，爱护干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作风。”

大哥朱婴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赤胆忠心和坚强意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1970年，他含冤去世前半年，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他的党的组织关系要恢复，他非常高兴，立即写下再一次宣誓的誓言，“共产党员四十年，革命征途多磨炼，而今幸蒙党不弃，百折不回永向前！”同时还写信嘱咐我同他要“各自努力耕耘后，兄弟扶杖看早秋”（“早秋”指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他病危了，自知不能继续为党工作了，乃向我们写下告别的绝笔诗，“自行期颐到百年，才近八十便世捐。强欲挣扎不随我，只留丹心在人间！”

大哥安息吧！虽然你长眠在华容黄湖山上，但你为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奋斗的一颗丹心，的确永远留在人间，留在千千万万人们的心里！

（本文写于1983年3月，郑州）

回忆父亲包泽英

包克庄

今年旧历8月23日，是父亲的87岁诞辰，转眼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26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还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不是什么伟人，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不朽业绩，但从参加“五四”运动起，特别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革命奔走呼号，先后3次被反动派逮捕，前后5年的监狱生活，受尽酷刑，始终未向反动派低过头，他那种追求真理，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不图名、不图利，愿为工人阶级服务终身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的。

父亲生性温厚，乐于助人，对劳动人民极富同情心。不管同辈或长辈与晚辈，都喜欢和他相处。他小时在家乡见有婆婆虐待媳妇的，丈夫打骂妻子的，以及倚强欺弱等不平之事，他都要与之评理，打抱不平，并且竭力地反对女孩缠足和男人留辫子。听母亲讲，祖母待人苛刻，有一次向佃户要租，父亲很看不惯，又不敢当面顶撞，事后便背着祖母，偷偷地从后仓里放谷还给佃户。父亲在上海时，只有一件长袍，出门才穿，平时穿短褂，有一次父亲出门穿了长褂，回家时却是内衣了，母亲问长褂呢？他却很轻松地说，“朋友生病，当了。”

1937年，父亲因从事革命工作，被反动当局逮捕，坐了几年监狱，身体遭到摧残。出狱后，又因地下工作的紧张繁忙，他病倒了，经组织批准返回故乡养病。他见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无法医治，多有误死者，便开了一个贫民诊所，为贫苦农民治病，周围十余里，甚至见十里远的农民，常来求医。记得有一个家住桃花山的孤苦农民患了巴骨流痰（即骨结核）背上流脓，来向父亲哭诉其苦，请求医治。父亲将他收留，免费食宿，每天为其打针服药，排脓洗伤。一段时间后，那人病愈回山，因穷得一无所有，为表示感谢之情，便编织了一个篾“笆斗”送作纪念。

一次，地方反动势力借机滋事，父亲为躲避风声，到巴陵表叔家去暂时回避。路过一家农舍，听见屋里哭哭喊喊，乱成一团，仔细一听，知是有人得了急病，他立即进屋为其诊治，后来那人病好后，多方打听，方知是父亲所为。

在乡期间父亲还作了一些社会调查，有时为了安静和安全，常常躲在卧房阁楼上写材料，阁楼上有一个小窗户，正对前头山上的大路，也能看见左、右方向的动静，若有情况，可以早撤离。

父亲非常疼爱儿女，但是要致力于革命工作，无暇顾及家小，全赖母亲克勤克俭，节衣缩食，抚育儿女。在战乱与流亡漂泊的生活中，5个子女，竟先后夭折了两个。1934年，母亲怀了我，那时父亲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生活十分清贫，父母商定生下我后送给别人，并在入院时把这事告诉护士托她设法，护士答应生下了她要。

母亲生下我后，父亲来医院看望，护士抱着我对父亲说，“是个小囡，送给我吗？”母亲接过我低头不语，又用眼打量父亲。父母亲见我小圆脸胖胖的，红红的，十分舍不得，对母亲说，“不送不送！再苦也熬得过来的。”以后父母历尽艰辛，我才得以长大成人。

父亲希望儿女们从小意志得到磨炼，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哥哥姐姐们到了求学年龄都离家住宿。除了伙食费外，不给零用钱，星期天回家，一律步行，远道的，放假回家再寄路费。所以，我们兄弟姐妹都从小过惯了清贫生活，学习上也不肯落后，待人接物都不违父母的教诲，这使父亲甚为欣慰。

抗战时期（1942年）我们住在四川云阳，姐姐以优异成绩考入金陵女中（迁四川万县）有一次父亲因事去万县，顺便去看姐姐，有一篇日记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

“今天冒雨去金陵中学探望韵儿，恰逢毕业考试，无法叫人，便坐在大门外的长凳上，看看进进出出的学生。从这些人的外表看，觉得学生都是有钱的，教员都是清贫的，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战时/经济的畸形。由于物价的飞涨，教员靠薪水吃饭尚且不够，那里还有钱添制衣服？从衣着的缕蓝，就可见其生活之艰苦。反之，四川的学生大都是富绅子弟，富绅们有的是粮食，在现时粮食贵如一切的情况下，他们手中有的是钱，所以学生们都是西装革履。……沉思中，韵儿考完出来，我见她穿一双青布鞋。虽说比不上那些少爷小姐那样阔绰，然而我却暗喜此儿在如许学生中未受时习熏染，将来

或许不辜负我送其入学之苦心……。”又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今日落了大雨，权儿和燕儿都用盆子接了许多屋檐水，预备制蒸馏水及食用。权儿拿得起一小盆水了，她去年还只有111cm长，今年就有120cm长了。我见他们这样劳动，心中暗暗作喜……。”可见父亲对我们从小养成劳动习惯，非常看重。

1956年我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说组织上批准我入党了，父亲听了非常高兴，那晚父亲给我谈了许多，人生、信仰、品格——等等。他说：“看着你们这样幸福，我心里多高兴哪！你们现在是生长在阳光普照，春回大地的幸福时代。党为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环境，真是来之不易呀！我象你这大年纪，国家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我总是心里沉甸甸的，每当看着流血牺牲的，饿死累死倒下的，对反动统治真是恨透了。我在长沙读书时，袁世凯在丧权辱国的廿一条约上签了字的消息传来，我们大家愤慨已极，不少同学顿足痛哭，一个同学悲愤中投江自杀以示反抗，我们便抬着他的尸体游行示威。曲折的斗争，残酷的现实，群众的支持以及革命同志的牺牲，使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革命，义无反顾。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时就是这种责任感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人本是个躯壳，但要是掌握了真理，有了信仰，就有了灵魂，就有了信心，过去不管坐牢也好，失败也好，总相信真理定会战胜邪恶的，我在上海被捕，解到苏州监狱，一到那里见难友伤病交加，吃的是烂菜霉米，生活条件差极了，便向狱方提出抗议，难友也起来斗争，要求